

世纪寄语

本刊编辑部

我们有幸沐浴 21 世纪的第一道阳光,有幸目睹走向全球化的世界和迈向现代化的中国的万千气象。值此跨入新世纪之际,我们向本刊广大读者致以新世纪的美好祝福!并以有限的文字及眼光,尝试展望 21 世纪中国社会学的前景。

一、社会学是时代精神的一种独特的自觉意识

社会学诞生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是在参与现代社会建构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一命题原本是社会学的初衷。当孔德将社会学划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大部分时,他不仅是表达了一种纯粹的学术意义,似乎也蕴含了其作为社会学创始人对这门学科所赋予的使命——着重关注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发展。

尽管在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学科进程中,社会学家们对社会学下过许多不同的、乃至相去甚远的定义,也曾从各自的角度阐述过社会学所拥有的功能,但是,就总体而言,其核心内容一直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探讨社会的结构及其整合问题;二是探讨社会变迁及其动力问题。在晚近的社会学发展潮流中,综合考虑这两大方面的倾向则变得越来越明显。

启蒙运动为社会学确立了最基本的思想源泉和知识动力;而工业革命则为之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社会学体现的是对时代精神的一种独特的自觉意识,在学科知识体系中,往往以“专题”形态展现其学术自觉能力。在冷战结束后及至 21 世纪,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学的核心内容与时代主题相融合,并提炼为一种学科主题,对民族国家,对国际社会的发展,以及对世界社会学知识的发展,都具有十分独特的重大意义。

二、中国社会学是开放时代的产物,是变革时代的产物

1840 年以后,国门被打开,力图富民强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将社会学引入了中国。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国策迎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社会学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重建社会学。

今天世界正走向全球化^①,这是一个更加开放的时代,是一个需要人们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面对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更加富于变化性格的时代,是一个需要人们在变化中应对一切的时代。这个时代亦为中国提供了自 1840 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极其有利的对外开放的良好环境。如果能够充分抓住机遇,中华民族就能够在迎接 21 世纪挑战的过程中全面实现伟大的复兴。对此而言,社会学应该扮演一种重要角色,社会学家必须承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在迎接 21 世纪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学需要探讨的重大课题至少有以下若干方面:

第一,探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

全球化并非仅限于经济领域。尤其是在当今时代,人类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文化活动

^① 全球化是一种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尽管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的起点是 15 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但实际上全球化是从 18 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确立并向世界各地扩张后才开始的。到 20 世纪晚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等各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当历史迈进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由于跨国主体及其活动的增加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和边界,加上个人和团体力量的增强,削弱了对国家的依赖。因此,如何充分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机遇使本国得到协调有序的发展,同时又避免它的消极影响,是社会学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现代化也是全球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表现为一种深刻的社会转型。这一过程在现代化早发的西方国家和现代化晚发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形成了极不平等的发展条件和状况。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根据自己的国情国力,抓住当前国际环境的有利时机加速发展,同时又避免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曾经走过的弯路,则是中国社会学家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

第二,探索有利于社会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促进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顺利进行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中国社会学重建之时,正是中国社会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急剧变迁之时。对于社会变迁的实际过程来说,有不同层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消解则是关涉社会结构转型能否顺利实现的“瓶颈”,因为它涉及到身份制、户籍制、城市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事关中国现今社会深层结构的问题。正因如此,它也是理解这种社会结构转型的最具中国特色的学术问题。新型社会结构要素的生长亟待制度创新来加以保障和促进。在建立新制度方面,首先要考虑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其次,要探索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的转型引起了极其显著的社会分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定的社会冲突。但并非一切形式的冲突都是破坏性的。在这方面,社会学家不仅要在建立各种具体的社会安全阀机制上进行探索,更应该在社会稳定和发展方面提出独到的见解。如果说有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准则的话,社会学家则应该强调以公平为前提去追求更高效的社会发展模式。

第三,加强对西方社会学最新发展动向的研究,在解答时代前沿问题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当今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呈现出学派林立、学说纷呈之势,同时也反映出各种思想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特点。它们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状态提出了诸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后现代主义”等学说。借鉴并关注西方社会学中的最新动向,不仅有益于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而且对我们现代化进程中将面临的陷阱和困境也同样有警示作用。这里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被一些西方社会学家直接或间接地继承和发展。例如冲突理论学派、批判理论学派等都从某些方面摄取了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或从某种角度对马克思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答。尤其当西方发达工业国家面临现代化困境的时候,马克思论述过的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解放等问题再次突显出来,从理论和实践上给予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考和探索,已经成为许多社会学家的关注点,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历史使命。中国社会学的发展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重新认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价值;更需要我们“发展马克思”——以我们的独特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

三、科学精神与价值关怀相结合的社会学学术建设

新知识和高技术推动下的全球化使世界日益缩小,社会日趋复杂,个人价值取向多元化。有的西方教育学家在探求新型价值观时,提出了应从侧重“教育完成”向“教育过程”转变的新世纪“教育观”。在社会转型中探索结构层面的制度创新的同时,重塑文化层面的社会价值和

道德,是社会学的所谓社会整合所应承担的责任。同时进行这两方面的研究与实践,也是为了有效防止社会解组或失范,促进社会稳定。如果社会学要在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中取得合法性,并要占据一席重要地位的话,那么它将面临两个互为条件的前提:其一,探求中国社会的机制与文化资源;其二,对中国社会现象与问题作出社会学的独特透视。为此,一方面,社会学家将其知识运用于现实社会的建设当中;另一方面社会学家还表达了对于社会理念和想象的追求,而这一作用的发挥又以对社会的缺陷和失范的关注、批判而达成。因此,它需要我们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敏锐的社会感受力。这些都源于良好的知识素养和悟性。因而我们认为,基于各种研究方法、风格、模式而得出的知识不应该相互排斥,而应相互尊重、兼容并蓄、互为补充,才能为学术建设铺垫基础,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就社会学研究而言,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应该相互弥补,最终不应该导致学术思想交流上的阻隔。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和解释社会科学本身的体系和发展。

在发展中国社会学和研究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努力达成科学精神与价值关怀的有机统一是一项基本前提。社会学要以科学的、客观的态度来正确地认识社会,这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是,忘记了价值关怀的社会学必然在其发展进程中遭遇危机。这种危机的最大特征就是无法回答社会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重视社会学价值关怀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关注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并不能成为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惟一指标。社会学家更关心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人所应获得的更多自由以及人性的全面发展。因此,如何在经济浪潮中避免成为经济动物?如何在技术社会重视技术的同时将技术的运用变得人性化?如何在消费社会中保持自我不被消费?这些都是社会学家所面临的新问题。

总之,社会学家要以客观的立场和眼光看待社会现象。但是,必须从强烈的价值关怀出发去研究和参与中国社会的建构进程。这正是韦伯所说的价值中立与价值涉入在当下中国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而辩证的处理。中国社会学家将能够为中国社会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社会学家应该发展什么样的社会学以及如何发展所认定的这种社会学。它自身的合法性以及发展的可能性,完全取决于它的学术贡献和实践效用,即它对世界社会学知识积累的所作之功以及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所尽之力。中国的社会学并非要完全具有本土的性质,成为一门仅适用于中国本地的社会学,但却一定是一门充分吸收了本国知识资源的社会学。

20世纪,社会科学在一定意义上曾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世纪。21世纪,负有众望的社会学,完全有可能去问津社会科学的皇冠。我们希望,在实现这个预言式的梦想过程中也有中国社会学家的一份最诚挚的努力!